

从“悬搁”到“重启”

——中国东南亚安全战略视角下的中马关系
演变(1978—1989)

蒋华杰

内容提要 中马两国于1974年建交,但双边关系在此后十多年里却陷于“悬搁”状态。尽管最高领导人数次实现互访,中马经贸关系提升却相对有限,政治上的敌意与猜疑也难以消弭。从中国的东南亚安全战略视角审视,这一时期整个东南亚地区冷战的结构性制约从根本上导致中马关系陷入长期“悬搁”状态,共产党和华人问题是这一结构性因素的外在表征。越南侵柬后,中国的东南亚安全战略核心是以柬埔寨为战略支点抵挡苏联南下,为此,中国全力促使柬埔寨三方形成以民柬为核心的体系化、制度化和长期化的抗越反苏联盟。这一政策导致中国遵循缓步解决的方针处理东南亚共产党遗留问题,进而客观上强化中马两国间的马共和华人障碍。此外,由于中马在柬埔寨问题上一度存有立场分歧,中国始终缺乏优先改善两国关系的意愿。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亚洲冷战格局松动,前述结

* 蒋华杰: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讲师。(邮编:200444)

** 本文系中国国际发展研究网络(CIDRN)资助项目“中国援外专家研究(1949—2019)”阶段性成果。感谢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牛军教授、《国际政治研究》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和建议,文中疏漏和不足之处概由笔者负责。

构性制约消失,中马关系才得以重启。

关键词 中国政治与外交 中马关系 东南亚安全战略 邓小平 马共 柬埔寨

1974年,马来西亚与中国正式建交,实现东盟国家与中国外交关系的历史性突破。中马建交不仅结束了中国与东盟国家间长期的冷战敌对状态,而且推动了该地区的新加坡、菲律宾等国与中国进行外交接触,进而影响接下来十几年东南亚地区政治外交格局和亚洲冷战格局转变。尽管率先建交,中马两国政经关系却在接下来十多年内陷于“悬搁”状态。双方领导人数次互访难以消解政治上彼此间的敌意与猜忌,双边经贸关系亦只在有限空间内提升。直至冷战落幕前夕,中马政经联系的密度和层次开始落后于中泰、中新等其他双边关系。

两国关系发展轨迹特殊,学界的研究也呈现相应特征。因其影响深远,学者对1974年两国建交的内外动因、过程及其影响均有深入讨论,^①形成较为多元化的研究格局。相比之下,长期处于“悬搁”状态的中马关系由于未有重大历史事件发生,也未对本区内国际关系格局形成支配性影响,加之两国政府均未解密有关这一时期的外交档案,学者们难以对其产生持续的学术兴趣。迄今为止,围绕这一时期中马关系的历史研究并未呈现如1974年建交事件那样持续的多样化发展趋势,正如马来西亚大学中国研究所主任饶兆斌(Ngeow Chow-Bing)教授认为,学术界在此问题上的探索“几乎呈现一片空白”。^②

即便如此,少数国内外学者依旧尝试对这一时期中马关系长期处于悬搁状态的原因做出初步解读。关于阻碍20世纪80年代中马关系无法进一步发

^① 其中,代表性研究参见 Ahmad Mokhtar Selat, “Malaysia-China Relations: The Winds of Change in the Early Seventies,” *Malays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2, No.1, 2014, pp. 83-104; Abdul Razak Baginda, *China-Malaysia Relations and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RK Jain, ed., *China and Malaysia, 1949-1983*, New Delhi: Radiant Publishers, 1984; 秦艳峰、喻常森:《20世纪70年代中马建交的背景与意义》,《东南亚研究》2011年第4期,第60—67页;王虎:《马来西亚对华关系背景分析:以马中建交过程为例》,《东南亚研究》2011年第4期,第68—73页;陈是呈:《唤醒沉睡的马中关系(1970—1974年):马中建交前马来西亚华人在社会与文化互动中的角色》,《南洋问题研究》2013年第3期,第41—52页。

^② 饶兆斌:《冷战结束前的疑虑、踌躇及突破:马中关系1974—1989》,载《“全球冷战中的马来西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9年9月28—29日,第231—242页。

展的原因,马来西亚拉曼大学的梁文勇教授(Stephen Leong)认为,吉隆坡因马共和华人问题而对华心存戒备,同时,贸易对马来西亚人利益的损害以及南海潜在的利益冲突也是重要因素。^①暨南大学周聿峨教授等人认为,冷战、马共和华侨直接影响建交后马来西亚对华认识,进而造成两国关系发展缓慢。^②饶兆斌教授从马来西亚对外关系的视角,将1974年到1989年吉隆坡对华政策的变化过程概括为“由疑虑、踌躇到突破”。他指出,马来西亚政府制定对华政策的考量因素包括对东南亚冷战格局的判断、国内安全、建国整合及经济发展,而马共问题的存在使得马来西亚对华的疑虑不会彻底消失。^③现有研究的共同点是从马来西亚对华政策的视角展开分析,在种族、宗教、经济、安全、冷战等因素构成的马来西亚对华政策的诸多因素中寻找阻碍中马两国关系发展的关键因素,其中,马共和华人问题被认为是不可忽视的关键障碍。

任何现代双边国家关系的特质均基于互动形成。就中马关系本身而言,当以互动视角观察两国关系时,不能忽视的基本事实是,由于地缘位置、人口、资源、文化和政治制度等固有国家形态差异,北京和吉隆坡在安全、经济等攸关国家利益的重大议题上就对手意图和目标进行的观察、认知和判断并非完全一致。换言之,就各自国家发展和安全战略的图谱而言,北京和吉隆坡处于非对等状态,双方由此会在同一时期对某问题的认知和应对上采取完全不同的立场与态度。具体回到前述马共和华人问题,现有研究已从吉隆坡视角证实它们是阻碍双边关系提升的关键性障碍。那么,转换视角来看,中国缘何在放弃世界革命目标后继续支持马来西亚共产党(也包括其他东南亚共产党)?更确切地说,中国缘何不彻底放弃势微的马来西亚共产党以推动中马关系发展,从而在双边贸易等现实性议题上争取更多的实质性利益?毕竟在改革开放的情态之下,中国的对外政策决策显然已非20世纪50、60年代那样被革命意识形态驱使。可以肯定,在这一对外政策发展剧烈变化的时期,中国高层的战略思维中存在一种经过深思熟虑且相当稳定的思考逻辑和决策排序,在这一套思考逻辑体系中,中马两国关系的优先性已被其他在中国看来更关切自

① Stephen Leong, "Malaysia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1980s: Political Vigilance and Economic Pragmatism," *Asian Survey*, Vol.27, No.10, 1987, pp. 1109-1126.

② 周聿峨、胡春艳:《中马建交以来马来西亚对中国认知之转变》,《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第124—128页。

③ 饶兆斌:《冷战结束前的疑虑、踌躇及突破:马中关系1974—1989》,第231—232页。

身核心利益的地区性乃至全球性的战略议题所取代。如此一来,为更为全面地理解中马关系悬搁的背后原因,需要超越双边关系范畴,从作为“另外一个关键方”的中国视角出发,重新认识持续左右 20 世纪 80 年代中马关系发展的全球性和地区性的政治、经济与安全因素。

需要强调的是,本文选择以中国的东南亚安全战略为基本观察视角考察 1978 年到 1989 年期间中马关系的发展脉络,主要是基于如下两点基本前提。首先,在中国决策层的思考框架内,对马共的态度和政策并非只是单纯涉及中马两国双边关系的议题,邓小平并非将其作为特定国别问题加以特殊对待,而是将其视为区域性共产党问题中的一部分加以思考并一揽子解决;其次,就中马关系本身的内容而言,尽管 1974 年到冷战结束前夕的中马关系长期悬搁、内容平平并且发展缓慢,但它却牵涉此间一系列重大国际事件和重要国际关系的变动,其中包括柬越问题、美苏的东南亚安全战略、中国的改革开放等。^①在很大程度上,在这一时期东南亚冷战国际体系乃至全球冷战国际体系变动中,中马关系处于被动性地位,这使其可以扮演“显示器”的角色,尤其是对于观察这段时期中国的对外政策而言更具有直接的样本价值。

如前所示,现有研究未能从中国视角解释双边关系悬搁十年的一个重要的客观原因是,中马两国政府迄今为止均未解密关于这一时期外交关系的核心档案,相比之下,中国方面的文献更是让学者难以触及。但近年来,不断出版的领导人年谱和回忆录,以及通过多种途径公布的来自外交部、中联部和对外贸易部的各种档案文献资料极大地丰富了中方的文献。以此文献条件,基于上述问题和假设,文章以 1978 年中国宣布改革开放从而在对外战略上做出新的重大调整为起点,回顾 1978 年到 1989 年中马两国政府之间的政经互动关系。在此基础上,本文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东南亚安全战略的视角出发,以两国关系中的关键议题——中国对马共政策和方针为切入点,^②分析中国的东南亚安全战略框架以及中马关系在其中的地位和角色,以探寻这一时期中马关系特征及其背后的深层性原因。

① 饶兆斌:《冷战结束前的疑虑、踌躇及突破:马中关系 1974—1989》,第 231—232 页。

② 两国间的华人华侨问题很大程度上也因马共问题所致,限于篇幅,本文重点分析后者。

一、中马高层互访及其限度(1978—1979)

对中国的对外关系而言,1979年极具分水岭意义,一系列重大政治外交事件从大国关系和地区安全层面重塑中国的外部国际格局和安全形势。年初中美建交并确定“间接同盟”关系,^①中国从而在中美苏三角关系框架内进一步推动确立联美抗苏的格局。1979年2月到3月,中国发动对越自卫反击战,由此使自1975年开始的中越政治经济分裂升级为中国和苏越联盟之间直接的军事交锋。

在对越作战之前,邓小平落实了一系列外交举措。自1978年初开始的一年内,他先后访问缅甸、尼泊尔、朝鲜、日本、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美国,东盟三国是重点之一。对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访问最晚7月开始酝酿,考虑到泰国总理江萨已于3月底访华以及担心越南领导人先期访问会导致局面被动,外交部曾提议邓小平尽快启程,但邓小平却表示不介意越南人走在前面。^②最终,邓小平对三国的访问被安排在日本之行后面。11月5日,邓小平从北京出发前往泰国,在这之前,苏联副外长费留宾(Nikolai Firubin)和越南总理范文同已于9、10月访问东盟五国。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位访问东盟三国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的到访为改善停滞四年多的中马关系创造了机会。整个访问议程最为核心的部分是邓小平与马来西亚总理侯赛因的两次会谈。1978年11月10日下午,在第一次谈话中,邓小平重点谈论自己对苏联威胁的理解和中国的对外政策。这位中国领导人向侯赛因强调了整个世界形势趋向紧张不安的根源来自霸权主义争夺,可见他很希望在苏联对东南亚地区构成威胁这个问题上与马来西亚取得共识。^③关于中国的对外政策,邓小平告诉侯赛因,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除同各国发展政治、经济、文化关系外,就是延缓战争的爆发”,后者是“中国处理国际事务的根本依据”。^④第二次会谈被安排在11日下午,谈话的

^① 《邓小平在第五次驻外使节会议上的讲话》,1979年7月19日,《赵政一大使工作日记(1979年)》,第49页。文中未注明馆藏信息的文献均为笔者个人收藏。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44页。

^③ 同上书,第424页。

^④ 同上书,第425页。

焦点转到马共和华人这两个敏感议题。邓小平保证中方的华人、华侨政策将持续稳定,但在马方最为敏感的共产党问题上,他却建议双方继续遵守1974年拉扎克访华时达成的默契,即将国家和政党关系分离,他认为“保持这个谅解,我们的关系才能得到更大发展”。通过这次谈话,中国领导人明确拒绝承诺完全放弃马共。^①

邓小平在访问三国期间就共产党问题所做的表态口径一致。根据原中联部部长朱良回忆,邓小平会见泰国总理江萨时明确表示“哪里有共产党不支持共产党的”。^②他特别强调了对东南亚各国共产党的支持是“原则性问题”,根据事后的转述,邓小平在访问三国期间就东南亚共产党问题所做出的解释大致如下:“作为共产党人,在这些原则问题上不可能有别的承诺,必须把国与党两个层面的关系分开,中国视有关政府同本国共产党的关系为内政问题,不予干涉。中国人如果在这样的问题上放弃自己的原则,采取错误态度,那么在国际上就没有对苏发言权。”^③很明显,这是一个更加倾向于政治道义的解释。

考虑到先行到访的越南总理已公开承诺不再支持东南亚共产党,邓小平这番表态的背后真正动机值得深究。作为自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参加与东南亚各国共产党交往活动的高层领导人,邓小平不可能对这些党无丝毫情感;同时,就外交技巧而言,如果紧跟越南后面做出类似声明肯定会造成外交上的极度被动,但显然情感和外交技巧均非最核心因素。

邓小平的东南亚之行是一场预防性外交,即要在已愈发明显地预感到越南可能入侵柬埔寨的情形之下,通过外交手段防止包括马来西亚在内的东盟诸国完全倒向苏越阵营,以此在东南亚孤立苏越两国。^④邓小平的这一打算从他前述对访问时机的选择上也可以得见。就预防性外交而言,邓小平很明显已经抓住了关键,他在与江萨、李光耀和侯赛因的谈话中不断试探并支持他们的和平、自由和中立政策。^⑤事实上,客观现状对中国十分有利。不同于印支国家,东盟国家主张在中苏之间保持中立。尤其是马来西亚,该国出于对自身安全的考量推行东南亚和平中立区政策,拒绝域外大国力量介入东南亚,这意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册,第425—426页。

② 中联部办公厅编:《中联部老部领导谈党的对外工作(上)》(内部资料),2004年版,第84页。

③ 总政治部编印:《邓小平副总理访问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简况:苏修在亚洲扩张的动向》(内部资料),1978年12月版。

④ 同上书。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册,第420、425、427、429页。

意味着它与苏越结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此,邓小平并不需要通过付出额外的政治、经济代价的方式,主动让这三国成为自己的盟友,事实上,该目标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短期内也无法企及。至少在当时被视为最大障碍的共产党议题上,邓小平自己也承认这是个复杂的历史问题,自然“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找到一种灵丹妙药来处理 and 解决”。^①

考虑到越南和苏联的威胁,马来西亚最终在中越冲突中采取中立态度。对于预防性外交而言,这确实是一个令人期待的结果。但由于在共产党问题上并未有任何实质性让步,邓小平到访对提升中马关系的作用十分有限。相比泰国在泰共问题上采取的理解态度,马来西亚对中国在马共问题上的立场极度不满。整个访问过程中,中马双方相互间充满疑虑,外交场面冷淡而尴尬。马来西亚政府有意在邓小平来访的问题上维持低调,甚至限制华人举办欢迎活动,^②邓小平则拒绝向马来西亚国家纪念碑献花圈。^③

意识到不可能在共产党问题上得到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政治保证,马来西亚对试图要入境的中国华侨采取各种限制措施。1979年前后,中国国内申请回东南亚的华侨人数达到80万—90万,他们的目的地主要是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和泰国。中国政府当时已经同意华侨出国,但东南亚各国尤其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采取了包括限制年龄在内的各种措施。中方对此心知肚明,时任国务院侨办负责人的连贯直言东南亚国家这样做是“害怕中国去的人会搞颠覆,宣传共产主义”。^④

半年之后的1979年5月,马来西亚总理侯赛因回访中国。从已公布的资料判定,侯赛因打算先集中精力解决难度较低的双边贸易问题,即与中国签订长期贸易协议彻底扭转逆差地位。自1958年开始,马来西亚在对华贸易中一直处于逆差地位,并且数额在1974年达到1.51亿美元峰值。^⑤20世纪70年代下半期,马来西亚对华贸易的逆差有所缓解,1977年首次实现贸易顺差,但量微且不稳定。作为多种中国所需原料的最大生产国,马来西亚对此并不满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册,第420、425、427、429页。

② 饶兆斌:《冷战结束前的疑虑、踌躇及突破:马中关系1974—1989》,第236页。

③ Lee Kuan Yew, *From Third World to First: The Singapore Story, 1965-2000*, New York: HarperCollins Publisher, 2000, p. 599. 纪念碑祭典的对象包括在围剿马共中牺牲的政府军军人,1975年曾被马共炸毁。

④ 《国务院侨办副主任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9年8月30日。

⑤ 外经贸部编:《对外贸易统计资料汇编(1950—1989)》(内部资料),1990年版,第52页。

意。1978年9月,马来西亚外长东姑(Tengku Ahmad Rithauddeen)要求中国增加进口本国产品,外贸部长李强表示会考虑购买更多产品,尤其是橡胶和棕榈油。^①

从贸易结构上而言,中国与除新加坡之外的东盟诸国均为初级产品输出国,但商品种类不同,双方之间的贸易因此具备互补性。由于对东盟的橡胶、木材、植物油、粮食和其他工业品有长期需求,^②加之一直处于贸易顺差地位,^③中国在贸易政策上积极主动。1971年,马来西亚贸易代表团访华,周恩来示意采取逐步发展或者签约方式推进贸易。^④1978年,邓小平在马来西亚访问时答应侯赛因增购橡胶等商品,^⑤李强为此于1979年3月访问吉隆坡商谈具体事宜。^⑥5月,外交部在侯赛因访华前夕讨论双边贸易问题,针对东盟提出的希望中国增购初级产品并进口中国产石油等物资的要求,外交部内的主流意见是应“适当满足,给予支持”。^⑦

由于双方不断地沟通和互相配合,侯赛因在贸易问题上取得进展。在他访华期间,中国承诺当年计划进口的橡胶、棕榈油分别不少于上年的10万吨和14万吨。^⑧6月,马来西亚外贸部副部长访问中国进一步推动双边贸易。双方的努力使得两国贸易开启了1974年以来的第三波快速增长小高潮。1979年,中国自马来西亚的进口额翻了近一倍,^⑨使得马来西亚自1977年以来第二次在双边贸易中占据顺差地位。

然而,中马双边贸易的曙光并不意味着马共问题也会迎刃而解。侯赛因访

① “Rithauddeen’s Press Statement in Peking,” September 23, 1978, in R. K. Jain, ed., *China and Malaysia, 1949-1983*, Sangam Books Ltd., 1987, p. 247.

② 《东盟国家对外贸易的发展及前景》,1981年5月22日,载外贸部编:《外贸调研》1981年第407期,第7—9页。

③ 中国与东盟的贸易中长期处于顺差地位。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中国的进出口收益中,东盟诸国是仅次于港澳的外汇来源地,贸易顺差主要因为菲律宾、泰国从中国大量进口石油。参见《东盟国家对外贸易的发展及前景》,1981年5月22日,载外贸部编:《外贸调研》1981年第407期,第7页;《东盟内部经济合作及对外经济关系》,1980年11月10日,载外贸部编:《外贸调研》1980年第363期,第10—11页。

④ 《马来西亚贸易代表团访华》,1971年5月31日,载外交部编:《外事动态》1971年第36期,第3页。

⑤ 《马首相宣布邓小平副总理答应增加输入树胶棕油加强马中贸易关系》,《南洋商报》1978年11月13日,第5页。

⑥ 姚昱:《马来西亚对中国树胶贸易政策(1950—1980)》,载《“全球冷战中的马来西亚”论文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9年9月28—29日,第223页。

⑦ 《外交部务虚会简报:东盟各国的战略地位和我们的工作》,1979年5月17日。

⑧ “Hussein Onn’s Speech at the Return Banquet,” May 5, 1979, in R. K. Jain, ed., *China and Malaysia, 1949-1983*, Sangam Books Ltd., 1987, p. 268.

⑨ 外经贸部编:《对外贸易统计资料汇编(1950—1989)》(内部资料),第52页。

问中国期间试图在共产党问题上突破僵局。据英国人了解,当被问到为何要支持东南亚共产党时,中方给出了新解释,即中国对东南亚共产党的帮助在本质上与马来西亚对伊斯兰主义的支持并无二样。^①将马共问题上升到国家意识形态价值观属性层面来解释,至少在逻辑上表明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暂时没有改口的打算。

最终,侯赛因访华无力纾解两国自1974年以来在政治上形成的相互猜忌和敌对的困境。以至于位中国驻英外交官也感慨,相比前任拉扎克,侯赛因的这次访问“更像观光旅行”。^②事实也证实这种说法并非空穴来风。1979年6月,侯赛因对外宣布,如果中国继续支持马共的活动,马政府无意松绑对华民间交流。^③实际上,两国之间的贸易合作也并非一帆风顺。在此之前,中国外贸部决定派遣一支贸易小组访问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寻求合作机会,但他们被迫在7月取消行程,原因是两国拒批入境签证。^④对未与北京建交的新加坡而言,拒签中国政府代表团实属正常,但吉隆坡在存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也这样做,却显示中马经贸交流渠道仍处于脆弱和不稳定状态。

二、“悬搁”:中马经贸有限推进与政治 疑虑的续存(1980—1984)

通过双方高层互访及期间一系列外交接触,中方对马来西亚外交政策的认识和应对原则初步成形,外交部部长黄华在1980年1月25日的内部讲话中对此有过总结。黄华认为,马来西亚对正在积极争取自己的中美苏越四方、四国都保持距离,吉隆坡在华盛顿、北京和莫斯科之间实行等距外交。至于马来西亚这样做的动机,黄华认为是因为它害怕苏联渗透和越南的军事攻击以及对美国多变的政策缺乏信心。黄华判断吉隆坡对中国的对越作战“表面上拍手称快,实际上怕(中国)攻击”。中方高层的共识是三点因素促使马来西亚不

① “Hussein ONN’s Visit to China,” May 22, 1979, British National Archive, London, Document Number: FCO15-2498.

② Ibid.

③ Stephen Leong, “Malaysia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1980s: Political Vigilance and Economic Pragmatism,” p. 1111.

④ 《对外贸易部关于取消五矿贸易小组访问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函件》,1979年7月5日,上海市档案馆,档号 B248-4-300,第110页。

愿意接近中国。第一是中国巨大的国家体量及发展潜力,即“中国的资源、人口和现代化步伐都(对马来西亚)造成一种精神压力”。另外两个因素是众所周知的华侨和共产党问题,它们被认为是“相对具体且十分敏感的障碍”。^①言外之意,这两个问题均直接地造成了马来西亚对中国形成防范和恐惧心理。基于上述判断,高层的想法是,对马来西亚要“谨慎小心”,采取“渐进式方法扩大关系”,同时“在外交上要给予必要支持”。^②至于如何“谨慎小心”或如何“必要”,黄华则未有明确解释。从这一系列模糊措辞可以看出,此时中国对马来西亚的政策基本上还处于一种边走边看的状态,中方并无迅速提升两国关系的迫切性。中马关系在接下来的几年内依旧处于缓慢发展的状态,双边交往中最为重要的事件是中国总理对马来西亚的访问。

1981年7月,马哈蒂尔就任新一届马来西亚总理。不到一个月,中国总理赵紫阳到访吉隆坡。中国总理这次访问的性质和重点与邓小平三年前的访问差异明显。作为其力主推动的经济外交的一个步骤,中国总理把议程重点放在两国经贸问题上。从中国自身的动机看,1980年底高层针对1978年开始的经济过热进行了大调整,一系列计划指标的下调导致对外贸易在1981年急速收缩,当年中国与东南亚贸易总额下降了12.5%。^③东南亚国家的对华出口未能幸免,以天然橡胶为例,1981年,中国的进口量由上年的28.02万吨骤降至15.65万吨,综合国际市场价格因素影响,进口天然橡胶的总价由3.3亿美元减到1.43亿美元。^④中马贸易所受波扰尤甚,是年两国贸易总额比上年减少31.8%,降幅居本区域各国之首。^⑤与此同时,中国在经历了1980年的中美关系波动之后开始重新推动第三世界政策。^⑥中国与当时占全世界人口70%的第三世界地区的贸易仅占总量的1/4,考虑到这一情况,面对第三世界的经济外交战略随即启动。马来西亚是重要的经济外交对象之一,中方内部认为需要继续扩大对马出口贸易,以便“增加现汇收入,提高进口支付能力”。^⑦

如前所述,中国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对马来西亚有所照顾,这一政策到1980

① 《对外贸易部关于取消五矿贸易小组访问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函件》,第110页。

② 《黄华:1980年代外交形势、政策与今后任务》,1980年1月25日。

③ 外经贸部编:《对外贸易统计资料汇编(1950—1989)》(内部资料),第50—54页。

④ 同上书,第241、261页。

⑤ 同上书,第52页。

⑥ 樊超:《1980年代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的缘起》,《国际政治研究》2013年第1期,第121—135页。

⑦ 《七十年代第三世界对外贸易特点及前景展望》,1980年5月24日,载外贸部编:《外贸调研》1980年第317期,第12页。

年并未改变。以中国主要的进口商品橡胶为例,1980年初国际市场的橡胶价格比1979年上涨25%,达到历史最高记录,^①但中国不仅在高价位增加进口量,而且在价格上有所让步。1981年,国际橡胶价格有所下跌,中国在橡胶贸易上继续给予马来西亚一定优惠。^②

马来西亚对中国在贸易方面给予的优惠与合作表示满意,但依旧对中国总理的访问施以冷眼。根据一位美国驻香港总领馆负责经济事务的官员观察,在总理访问的东盟几国中,马来西亚对中国总理的态度十分冷淡,远不如菲律宾热烈。^③背后的原因是始终无法绕开的共产党问题。侯赛因政府一直对中国未完全斩断与马共的关系心存芥蒂,他本人执政末期在马共问题上持续对中国施加压力和表达不满。1980年3月,马来西亚政府公开宣布,如果中国保留与马共的“党对党”关系并继续支持“马来亚革命之声”,他们就有权对此“做出自己的解释”。言外之意,如果中国继续支持马共,那么,马来西亚政府将不会接受中国此前在各种场合就自己与马共保持关系所做出的全部解释。3月14日,在举行欢迎中国外交部长黄华来访仪式的几个小时之前,马来西亚政府以处死三名在押马共成员的方式向中国外交部部长亮明自己的态度。^④

考虑到需要获得马来人的支持来稳固执政地位,上台伊始的马哈蒂尔在马共和华人问题上选择强硬路线,以至于不少马来西亚华人批评他是极端种族主义分子。从时机上讲,中国总理此次访问无法起到最大程度化解两国政治互疑的作用。让情形更为恶化的是,中国总理在菲律宾访问期间就公开表示要继续维持与东南亚各国共产党的关系。虽然他保证这种关系“只是政治和道义上的”,并且中国不会以此干涉东南亚各国内政,^⑤中国总理的立场得到了包括澳大利亚驻香港专员克林特·诺思(Clint. North)在内的一些西方外

① 《一九八零年国际商品市场前景展望》,1980年3月13日,载外贸部编:《外贸调研》1980年第299期,第2页。

② 《澳美驻港外交官认为赵总理访问东盟三国很成功》,1981年8月26日,载新华社编:《国际内参》1981年第66期,第2页。

③ 同上,第2页。

④ 李亚男:《冷战后期中国对东南亚地区政策调整(1978—1986)》,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第158页。

⑤ 《赵紫阳在马尼拉记者招待会上指出,中国希望东盟国家和平安定和繁荣》,《人民日报》1981年8月10日,第6版。

交官员的理解和支持,^①但这丝毫未消解马来西亚政府的不满与猜忌。马哈蒂尔最终在共产党问题上公开向中国总理发难,而后者显然无法立刻更改既有态度。10月12日,马来西亚外长加扎利(Ghazali Shafie)批评中国既要维持两国政府关系同时又要维持与共产党关系的双重做法,他直言“只要这种平行关系存在,两国关系就很难进一步发展”。^②

由于马共问题的影响,中国总理此次访问对推动经贸发展的作用差强人意。1982年,中国与除菲律宾之外的东南亚各国的贸易出现恢复性增长,且平均增长率为16.2%。相比之下,中马贸易额只回升了6%。^③此时,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贸易重心已转移到泰国和新加坡。泰马两国的产品结构比较类似,在对华出口方面存在高度竞争关系同时也具备相互替代性。泰国1978年的橡胶出口量达到44万吨,产量完全可以满足中国的全部需求。1979年,中国向泰国出口包括石油、机械、化工原料在内的2.1亿美元商品,进口大米、橡胶、玉米等0.83亿美元的产品。双方贸易额迅速提高,1982年的总额比1981年猛增23.7%。中国外贸部门优先发展中泰贸易的倾向十分明显,他们不仅满意泰国低廉的商品价格,而且认为两国贸易存在着“运输方便、华侨多、政治关系好”等优势。中方内部尤其视政治关系为贸易稳定发展的关键前提,相比中马间充满疑虑和猜忌的状态,泰国因感到苏越威胁不断地拉近与中国的关系,中方认为这是发展对泰经贸关系的“一个很有利条件”。^④

马来西亚政府对华存有的政治疑虑,也从其与苏联、越南两国和台湾地区之间的关系上侧面显露出来。基于共同的“反共”理念,马来西亚与台湾地区长期保持密切联系,双方不仅在经济、文化和外交方面往来频繁,而且将合作延伸到军事领域。1982年,蒋经国的心腹王昇访问吉隆坡,双方的合作进一步拓展,马来西亚军方在涉及最高军事机密的电子战问题上向台湾地区寻求帮助。^⑤马来西亚对苏联和越南的态度相对暧昧与复杂。尽管苏联彼时是马来

① 《澳美驻港外交官认为赵总理访问东盟三国很成功》,1981年8月26日,第2页。

② Ahmad Mokhtar Selat, *Malaysia's China Policy: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Master thesis,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April 1987, p. 63.

③ 外经贸部编:《对外贸易统计资料汇编(1950—1989)》(内部资料),第52页。

④ 《泰国对外贸易的发展趋势和市场特点》,1980年6月12日,载外贸部编:《外贸调研》1980年第323期,第10页。

⑤ “Minutes of the Meeting Between Wang Sheng and Vice Defense Minister of Malaysia Abang Abu Bakar,” March 29, 1982, Box 16, Wang Sheng Papers,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Wilson Center Digital Archive, ID:123463.

西亚最重要的橡胶买主之一,但出于对越南的印支联邦计划和苏联介入东南亚的担忧,马来西亚政府对苏联外交人员的活动高度警惕并设有限制,但却默许他们在马国内采取针对中国的各种攻击行为。新华社记者发现,苏越外交官在马国内诸多场合利用华人和共产党问题针对马政府内的马来人官员挑拨中马关系,并且苏越使馆的新闻官和塔斯社驻吉隆坡的记者十分活跃,他们每隔几个月就要到马来西亚全国各地访问一次并到各使馆散发宣传材料,其中关于柬埔寨和柬共的材料最多。新华社记者发现苏联和越南的宣传“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许多华人认为中国不应该继续支持曾迫害华人的柬共,与北京关系十分密切的《星报》总编谢诗坚也因柬共屠杀华人而对波尔布特十分痛恨,^①这让中方颇感被动和尴尬。

与此同时,因担心共产党影响,马来西亚政府在政治、经济和教育方面针对华人的种族歧视日趋严厉。20世纪80年代初,在马来西亚工作和生活的华人发现本族人在政府部门中的职位天花板已坍塌,华人所能担任的最高职务只能到副部长级别。马来西亚政府在贷款、投资、工商业和贸易等经济活动领域给予马来人特别优厚待遇,同时对华人采取种种限制。马来西亚政府还规定国立中小学必须使用马来文教学并逐步取消民办华文学校的华文教育。上述种种限制措施使得不少当地华人对政府的“民族平等”政策完全丧失信心,日益感到前途渺茫且难以真正融入当地社会。^②

三、“悬搁”的背后:“马共障碍”与中国处理 东南亚共产党遗留问题的方针

高层互访并未根本上改善两国关系,上述事实证明,马共问题始终是马来西亚疑虑中国的关键因素。由于共产党问题在东南亚数国均有存在,中国在马共问题上的考量并非限于特定国别政策,前述邓小平访问东南亚三国时就共产党问题做统一表态的做法亦可证实这点。“马共”问题之所以长期无法得到彻底解决并成为阻碍双边关系发展的障碍,背后直接起作用的是20世纪80

① 《苏越利用马来西亚华人问题挑拨中马关系》,1981年12月30日,载新华社编:《国际内参》1981年第101期,第20页。

② 《马来西亚华人谈马华人处境等问题》,1982年6月6日,载新华社编:《国际内参》1982年第44期,第16页。

年代初期中国制定和执行的分阶段缓步处理东南亚共产党遗留问题的区域性外交方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即着手支持东南亚各国共产党革命运动。^① 各党命运在此后 20 多年中多有波折,到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国际共运形势悄然转变,世界革命趋势已不再,印尼共、马共、缅共、菲共、泰共的活动均陷入低谷。1979 年,全世界 200 多个共产主义政党和组织中,与中共有联系的新党只有 100 多个,分布在近 60 个国家。中联部调查后发现,这些新党半数以上因遇到较大困难而处于“停滞和基本消失的状态”,世界范围内路线跟随中共且活动和组织都正常的政党组织不到 20 个,且多数影响极为有限。^②

此时,中国对国际共运的政策已经处于调整之中。1978 年 6 月,中共与最早被贴上“修正主义”标签的南共联盟恢复关系,这成为中国政党外交的转折点,中共随后从意大利共产党开始恢复与各国老党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中共与这些政党的交往原则发生质变。1980 年 5 月 31 日,邓小平建议各国党的方针和路线要根据本国情况制定,不能按照他党发号施令。^③ 寻求建立平等关系而非之前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的做法此后被确立为党际来往的基本原则,中共中央要求中联部不必促使外国政党遵循中国的经验和立场。^④ 1982 年 9 月,中共十二大报告正式以书面方式确定党际交往四原则,即“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

到 1979 年,考虑到除新加坡之外的东盟各国均存在不同程度地受中国支持规模不等的共产党武装,如何处理与东南亚各共产党的关系已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外交部最早提出转变形式支持东南亚各国共产党的建议,概而言之即“今后要继续支持这些国家人民的革命斗争,但在程度和方式上要同这些国家革命斗争的形势相适应”。考虑到需要联合东盟反苏,加上该地区并不存在可以让各国共产党继续武装斗争的内外条件。外交部内的主流意见主张要让东南亚各国共产党自力更生,减少对中国援助的依赖,同时,建议在有关这些党的宣传报道和礼宾问题上取消“形式主义”。^⑤

① 沈志华:《毛泽东与东方情报局:亚洲革命领导权的转移》,《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1 年第 6 期,第 27—37 页。

② 中联部办公厅:《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简史》(内部资料),2008 年版,第 152 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室编:《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18—319 页。

④ 中联部办公厅:《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简史》,第 152 页。

⑤ 《外交部务虚会简报:东盟各国的战略地位和我们的工作》,1979 年 5 月 17 日。

作为直接负责东南亚共产党事务的主管部门,基于政党外交要“明朗化并增加和保持灵活性”的原则,中联部的想法与外交部不谋而合。具体到东南亚共产党问题上,用部长姬鹏飞的话讲,中国需要突破过去长期存在的“团结与斗争”的国际阶级斗争思维窠臼,基于反霸的对外战略目标,采取灵活政策,做到“既发展中国与东南亚各国政府的关系,也履行国际主义义务”。^① 鉴于此,中联部建议“要逐步地、有计划地(在十年内)处理东南亚共产党的问题”。1980年1月初,中共中央经讨论批准中联部建议的方针,开始正式调整与东南亚共产党的关系。据现有史料,这一方针的具体内容为“对缅、泰、马、菲等长期坚持武装斗争的党,要同他们交换对东南亚形势的看法,推动他们适应新的情况,改变斗争策略,高举民族独立的旗帜,把争取国内和平同国际反霸统一战线工作正确地结合起来,建议他们着重采取秘密工作和合法斗争相结合的方式,打开新局面”。^② 它表明决策层已经下决心维持党与国关系分离的原则,继续支持包括马共在内的东南亚各国谋求生存与发展,只是在形式和方法上做出改变。具体而言,中国要对东南亚各共产党保持政治和道义支持,鼓励他们更多地走合法斗争的路线,同时逐步减少经济援助,以便更好地调和党与国关系间的矛盾。

中方此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大幅减少对东南亚共产党的公开支持。从1980年开始,《人民日报》等官方媒体不再刊登涉及各国共产党的报道。各党负责人访华的迎送规格被降低,他们不再被邀请参加检阅群众、国宴等各类国家庆典仪式和公开政治活动。外交部当年开始严禁外交人员直接与当地共产党发生任何形式的往来,相关的联络和接触工作由中联部全权负责。^③ 此外,中国政府在援助政策上进行了调整。1980年,乔石告知来访的缅共代表团,中国将继续在精神上支持缅共,但经济援助要在未来五年内减少并终止。在这之前,中国顾问团和志愿军事人员全部撤回。^④ 当年底,中国拒绝了菲共关于援助武器制造技术资料的要求,并表示可以协助菲共完成人员疏散和转移工

① 《姬鹏飞在驻外使节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79年7月。

②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工作汇报提纲》,1980年10月9日,湖北省档案馆,档号SZ1-8-185,第12—13页。

③ 《黄华:1980年代外交形势、政策与今后任务》,1980年1月25日;《姬鹏飞在驻外使节会议上的讲话》,1979年6月。

④ 杨美红:《罂粟花红:我在缅共的十五年》,香港:天地图书出版2009年版,第263—264页。

作,以便为彻底结束该党的武装斗争做准备。^①

中共对马共的政策基本遵循了缓步解决东南亚共产党问题的方针。两党关系可以追溯到1930年,马共在成立之后不久便与中共建立联络。1949年后,中国长期在政治和经济上援助马共。在接下来的十多年中,马共曾数次尝试和谈未果,加上军事斗争失利,其武装力量到1961年只剩下约350人。当年,马共受中共影响开始重新确立武装斗争路线,并于1968年提出农村包围城市路线,陈平等决定从泰国南部派遣马来亚民族解放军突击队回马来亚开展群众工作和游击战。但一年后马共内部就因肃奸分裂成“革命派”和“马列派”,1976年1月,双方发生武装冲突。^② 马共始终未取得政权,事实上自1973年开始,其实力由于内部分裂已日益衰弱。对中国而言,马共革命在遭遇自身外交政策转变的情形时就会成为棘手的问题。1974年,马来西亚总理拉克访华要求中方放弃马共以实现两国建交,但毛泽东坚持“共产党要支持共产党”。^③ 最后,马方被迫退让,双方在党与国关系分离原则下建交。

中马建交对马共形成不小冲击,迫使其一度在宣传和军事上采取了相对激进的做法,马来亚革命之声电台在之后几年中持续发动一系列公开宣传攻势配合马来亚民族解放军针对政府的袭扰。^④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对此尤为不满,他们以改善国家关系为筹码不断向中国施压。1978年11月,李光耀向来访的邓小平要求马共停止广播。^⑤ 1980年10月底,马来西亚委托访华的泰国总理炳·廷素拉暖带话,希望中国取消对共产党的支持并关闭马来亚革命之声电台。^⑥ 李光耀在11月9日到访时也再次重复同样的要求。^⑦

中方对此回复需要时间考虑,显示其在电台问题上的立场已有软化。在缓步解决东南亚各国共产党历史遗留问题方针之下,马来亚革命之声电台从中国境内公开对外进行播放的做法已属于“形式主义”,同时考虑到在联合国柬埔寨席位问题上需要东盟国家支持,邓小平很快决定满足马来西亚政府的

① 吴映平:《中联部关于菲律宾共产党代表团所提问题的看法和意见》,1980年12月。

② 中联部:《各国共产党概况》,内部资料,1980年版,第77页;关于马共早期历史的研究,参见何启才:《马来西亚左翼运动的发展与影响:以马来亚共产党(1930—1989)为例》,厦门大学博士论文,2016年。

③ 《毛泽东会见马来西亚总理拉克的谈话记录》,1974年5月29日。

④ 中联部:《国际共运大事记(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二月)》(内部资料),1975年版,第106—107页。

⑤ Lee Kuan Yew, *From Third World to First: The Singapore Story: 1965-2000*, p. 600.

⑥ “Telegram from Ambassador in Bangkok to FCO: Prime Minister’s Visit to China,” November 6, 1980, British National Archive, London, Document Number: FCO 15 / 2763.

⑦ Ibid.

要求。12月6日,他亲自接见陈平要求次年6月底关闭电台。^①1981年6月30日,位于湖南的马来西亚革命之声电台停播并搬离中国,在华的马共人员逐批离华回到游击区。1980年底,为安抚撤电台事,邓小平曾向陈平保证要继续提供财政援助。^②一年之后,中联部告知马共经济援助将按计划逐步减少。

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马共军队和组织大部分位于泰国南部境内。据泰国军方统计,到1982年上半年,马共在泰境有约三个团共1200名军人,在马境内只有约500人。此时马共组织内的主流、马列和革命三派依旧处于分裂状态,武装冲突时有发生,但都对华保持良好关系。马共在泰南地区控制的乡村内辖约五万居民,经过数年经营,马共与当地民众的关系基本处于和睦与稳定状态。马共的经济来源除国际援助,还有当地税收、商品走私及种植等。^③

马共得以在泰南地区获得生存空间,除了得益于中国的援助和支持外,泰国政府的态度最为关键。20世纪80年代初,泰南地区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各种武装力量频繁活动,除马共之外,该地区还有受马来西亚影响并从事分裂活动的穆斯林武装分子。泰国政府认为,后者对泰南地区的稳定构成更为严重的威胁,泰马关系曾因此一度趋于紧张。在此情形之下,马共非但不被视为泰国的首要安全威胁,而且一定程度上成为泰马之间在国家安全问题上相互掣肘的筹码。1982年6—8月,泰国军方取代马来西亚军队执行围剿马共的任务,实际上对马共力量的打击留有余地,结果并未造成根本性破坏。^④

目睹中越反目以及两国对外政策中的“革命积极因素”和“国际主义革命色彩”都在减弱,马共高层在1980年已意识到“本区域革命将出现新景观”,遂在路线方针上进行大调整。陈平等人更强调走独立自主路线,即“革命立足于本国人民和自力更生为主”。^⑤1980年4月,马共召开扩大的第二届中央委员会会议提出新形势下的斗争方针与政策,认为革命还处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阶段,争取“人民”利益和“民主”权利被认为是当下斗争的中心内容和政治诉求。基于上述考量,马共中央将在根据地重建的电台更名为“马来亚民主之声”,并以宣传爱国主义与人民民主思想为中心工作。马共武装在此前后也进

① 《邓小平与陈平的会谈记录》,1980年12月6日。

② Chin Peng, *My Side of History*, Singapore: Media Masters Pte Ltd, 2004, p. 459.

③ 《采访被泰军攻占的马共基地见闻》,1982年9月15日,载新华社编《国际内参》1982年第73期,第10—12页。

④ 同上,第10—12页。

⑤ 《马泰边区风云录》,时间不详,华东师范大学当代文献与史料中心藏,《阿成史料》系列,编号0307。

行了调整,马来亚民族解放军更名为马来亚人民军。^① 1983年开始,马共继续通过广播宣传包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农村包围城市、统一战线等在内的中国革命经验。^② 但在学习参照中国经验方面,马共领导人却更为谨慎,他们主张学习和灵活运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经验,但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阿成等人认为处于游击斗争状态下的马共“不可能照搬”。^③

四、战略支点上的错位:中马在柬埔寨问题上的分营对垒

缓步解决东南亚共产党遗留问题方针的形成并非孤立事件。已有研究指出,这是中国反苏统一战线的结果,^④也就是说,中国要在东南亚地区团结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各种力量形成统一战线应对苏越的扩张。这一结论表明,中国对马共的政策与20世纪80年代其在东南亚地区的安全战略有着密切的因果逻辑关系。从中国当时在东南亚的整体安全战略角度看,中国在处理共产党问题上采取双轨制框架下缓步解决策略,是基于其以反苏为主线的整体性对外安全战略考量的结果。

中越战争及苏联入侵阿富汗这两场地区热战从根本上形塑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周边安全的基本格局。为防止苏联在地缘上形成合围,中国直接或者间接地参与了这两场战争,并在20世纪80年代将其作为在南向和西南向国土外抵挡苏联南下战略的两个战略安全支点进行经营。对苏联威胁的判断成为中国决策层全球战略考量的一个关键出发点,对苏方针被视为“对外(政策)的关键性问题”。^⑤ 基于历史经验和现实考量,邓小平一直主张对苏联采取强硬政策,他不断在重要的内政和外交场合重复关于苏联威胁的政策话语,并力图使之成为中国领导人和主要职能部门决策思考的基本出发点。^⑥

① 《马泰边区风云录》。

② 《马来亚民主之声广播电台:马来亚共产党五十年的经验总结》,1983年4月28日,华东师范大学当代文献与史料中心藏,《阿成史料》系列,编号0174。

③ 《领导同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四周年庆祝会上的讲话》,1983年,华东师范大学当代文献与史料中心藏,《阿成史料》系列,编号0176。

④ 李亚男:《冷战后期中国对东南亚地区政策调整(1978—1986)》,第5页。

⑤ 《胡耀邦在书记处90次会议上的讲话》,1981年3月9日。

⑥ 《邓小平同志关于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同志在第五次驻外使节会议上的报告》,1979年7月19日;《邓副总理会见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的谈话》,1979年9月25日;《邓副总理会见法国前总理、前议长埃加·富尔时的谈话》,1979年10月31日。

尽管已将外交重点重新收缩回亚洲,但为应对苏联在全球范围内形成的南下威胁,邓小平此时在国家安全战略上遵循了将所有地区问题纳入全球视野中思考的思路。1979年5月,邓小平在接待侯赛因来访时指出,中国把印支问题视为苏联全球战略的一部分来看待,因为“不从这个角度来看,就不能看清楚印支问题的实质”。^①地区问题全球化的逻辑在1982年8月中方提出的中苏关系“三大障碍”上也体现得十分明显,印支问题被上升到左右中苏关系的战略层面。邓小平相信“老虎屁股可摸”,他不止一次提到教训越南就是从全球战略考虑的,目的之一是破坏苏联的战略部署。^②

就全球安全而言,中国开始在中美苏大国关系层面上采取联美反苏的策略,尽管后来适当拉开与美国的距离形成近美远苏的态势,但在三角关系中对苏保持战略压力的目的始终一致。在非洲,中国实施包括援助在内的一系列措施维持对苏联持续的战略干扰。^③相比之下,印度支那和阿富汗是中国遏阻苏联合围的关键点。越南出兵柬埔寨被中国决策层视为苏联整个南下战略的组成部分,是其全球扩张战略的重要步骤。1980年10月,邓小平正式公开将柬埔寨与阿富汗视为两个对抗苏联南下威胁的战略支点,并认为“要坚决在这两个点上顶住”。^④战略层面上的“顶住”需要一系列政治、外交和军事工具的支持,甚至不排除极端条件下的全面军事介入。1979年4月初,中国军队已经完成了对越作战的再准备工作,8个月后,中国决策层敲定一项军事预案,即解放军在必要时将进行一次或者多次的对越作战,并在新的世界大战爆发的情形之下采取军事措施,以此彻底消除被苏联及其盟友合围的潜在隐忧。^⑤

由此不难理解,在1979年之后的很长时间内,柬埔寨议题在中国对外安全战略中的特殊角色,援柬抗越(苏)成为中国整体对抗苏联的一个重要环节。中国经营这个战略支点的根本策略就是,在中越边境一线保持对越南灵活、适度和长期的军事压力,同时,寻求在柬埔寨建立体系化、制度化和长期化的抗越机制,以便在这两个地区给苏联制造困难,打乱其扩张部署,从而为柬埔寨问题的政治解决创造最终的有利条件。用中国总理的话来说,政治解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册,第510页。

② 《外交部转发邓小平谈越南问题》,1979年3月1日,福建省档案馆,档号222-12-287,第4—5页。

③ 蒋华杰:《现代化、国家安全与对外援助:中国援非政策演变的再思考(1970—1983)》,《外交评论》2019年第6期,第121页。

④ 《邓小平副主席、赵紫阳总理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的谈话》,1980年10月10日。

⑤ 《黄华:1980年代外交形势、政策与今后任务》,1980年1月25日。

决必须先对越南施加压力,采取有效措施支持抵抗运动是施加压力的必需步骤。^①为此,中国全力支持柬共并促成西哈努克、波尔布特和宋双代表的柬埔寨三方抵抗力量联合。在此情况下,从1979年开始到冷战结束,援柬抗越成为最高决策层对外战略布局的一个重要部分。中国在近十年的时间里全力支持民柬抗越,“哪怕只剩下1000人,也要支持它(民柬)”。^②

对越作战结束不到一个月,中国决策层已认定柬埔寨问题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政治解决,针对苏越的柬埔寨抵抗运动将长期存在。^③然而,此时,中国决策层内部在是否援助柬共的问题上出现重大分歧。其根源在于两点客观事实:第一,中方与西哈努克在联合柬共问题上态度南辕北辙,西哈努克坚决拒绝与波尔布特合作;第二,柬共无法被包括东盟和英法澳等在内的反苏越国家接纳,中国如继续公开支持柬共将会面临巨大的国际外交压力。也正因如此,柬埔寨问题的棘手程度被认为是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外交工作从未遇到过的。考虑到西哈努克和英美等国的立场以及柬共的声誉,以王炳南为代表的一派认为应该放弃柬共支持西哈努克。姬鹏飞和其他高层则立场相反,他们认为须正视柬共作为一支有效抵抗力量的事实以及西哈努克和平计划的不切实际。^④

邓小平态度务实,1979年8月27日,在与美国副总统蒙代尔的交谈中表达了关于柬埔寨问题的三点想法。首先,中国将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前提设为越南从柬埔寨全部撤军。至于政治解决的时机,邓小平认为“就是越南受不了的时候”。其次,邓小平间接地表达了对西哈努克的不满,他认为西哈努克作为一个民族领袖排斥波尔布特是“看得太近,站得太低”。邓小平暗示中国不会逼迫西哈努克,但断定西哈努克抛开柬共另立政府的计划不切实际,因为“他没有真正的力量”。邓小平还暗示西哈努克如想获得中国支持,就必须改变做法,用他的话说就是“(柬埔寨)国家元首只能是西哈努克,但不是现在的西哈努克”。最后,也最重要的是,邓小平解释了中国支持柬共的原因,就是

① 《赵紫阳总理谈国际形势》,1981年5月18日,河北省档案馆,档号937-4-140,第72页。

② 中联部办公厅编:《中联部老部领导谈党的对外工作(上)》,第92页。

③ 《基辛格访华简报(第四期)》,1979年4月26日。

④ 《黄华、王炳南、姬鹏飞、王耀庭等有关援助柬共问题的发言记录》,1979年6月。

“现在唯一能够抵抗越南、在国内坚持斗争的还是波尔布特”。^①不久,邓小平将这一想法公诸于世,他告诉意大利记者奥林埃娜·法拉奇中国支持波尔布特“没什么奇怪的”,因为要“正视现实”。^②

邓小平对柬共的支持显然不是出于继续推动世界革命的需要,甚至也难以称得上是“半个革命”动机,^③而是一种基于对局势的判断所做出利益最大化决策选择。对比柬埔寨抗越三派力量,尽管在越南入侵的时候遭到了重大军事打击,柬共的军事能力依旧最强。1979年底,柬共经过改组成立民柬政权,清点整编后的军队人数超过3.1万,约占当时整个抗越力量总和的七成。^④柬共军队此后恢复到4万—5万人规模,考虑到彼时柬境内的越南军队约有18万人,中方曾建议波尔布特在三年内将军队扩至12万人,加上宋双的军队,抗越力量能在局部军事接触面占有优势并形成整体上的均势。^⑤相比之下,宋双阵线的军队无论质量还是数量都处于劣势,其军队的基础是朗诺旧军官领导的三股散兵,人数在1981年前后只有三千多,到1984年勉强发展到约1万人。^⑥三派之中,西哈努克的军事力量最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从逻辑上讲,中国在全力支持柬共的同时不可能即刻中断对其他东南亚共产党的援助。更何况,东南亚各国共产党在反苏越问题上与中国高度一致。1979年初,泰共将支援柬埔寨抗越作为全党主要任务,并于11月公开声明愿意在苏越入侵泰国的情况下团结各种力量赶走侵略者。^⑦马共公开支持中国对越作战,谴责苏联入侵阿富汗和越南的地区霸权主义且主张在马来西亚国内建立反苏统一战线。马共内部认为“苏越霸权主义及其走狗同我国各民族、阶层之间的矛盾已在上升,并可能成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⑧

① 《外交部:接待蒙代尔访华简报(第七期)》,1979年8月27日;“Summary of the Vice President's Meeting with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Vice Premier Deng Xiaoping,” August 27, 1979, The U. S. State Department, ed.,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77-1980, Vol. XIII, China*, pp. 942-943.

② 《邓小平副总理会见意大利记者奥林埃娜·法拉奇的谈话》,1980年9月8日,载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80年第75期,第10页。

③ 1981年5月,中国总理曾对外表示支持民柬不是支持波尔布特本人,而是支持一项公认的国际准则,支持民柬主要是为了反对越南侵略,不意味着将来支持波尔布特执政。参见《赵紫阳总理谈国际形势》,1981年5月18日,第17页。

④ 《黄华:八十年代外交形势、政策与今后任务》,1980年1月25日。

⑤ 《胡耀邦与金日成谈话记录》,1984年11月27日。

⑥ 《柬埔寨各方出现联合抗越新趋势》,1981年3月11日,载新华社编:《国际内参》1981年第18期,第2页;《胡耀邦与金日成谈话记录》,1984年11月27日。

⑦ 《黄华:八十年代外交形势、政策与今后任务》,1980年1月25日。

⑧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马共关于国内外形势的看法》,1979年8月。

中国基于自身在柬埔寨问题上的战略利益考量全力支持柬共,不仅直接导致马共问题无法即速解决从而影响中马关系,同时也使得三方抗越联盟问题复杂化。1980年开始,中国和东盟在抗越联盟问题上的分歧和冲突不断加剧。中马两国在这一过程中始终处于分营对垒的状态,严重制约两国政治互信的建立。

相比阿富汗战场上的反苏战线,柬埔寨抗越联盟问题十分复杂,主要根源来自西哈努克、柬共和宋双三派抵抗力量彼此间深刻的矛盾。让问题更为棘手的是支持三派的国际力量间也存在着利益纠葛,其中最主要的是中国(也包括泰国)和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三国之间的分歧。

中国从全球反苏的层面认知和解决柬埔寨问题,马、新、印尼三个东盟国家却力主将其视为东南亚区域性问题的加以解决,三国的基本应对思路是让中苏两个域外大国退出东南亚,由东盟和其他印支国家直接与越南对话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①这一思路在1980年3月26日马来西亚联合印尼发布的《关丹宣言》中体现得淋漓尽致。^②考虑到对共产党担忧、西哈努克与民柬之间的矛盾以及国内民意基础等因素,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尼三国在抗越三方中选择支持宋双成为抗越联盟的主导者。然而,中国却对宋双疑虑重重,在北京看来,在三派矛盾无法调和的情形下,放弃有历史感情和政治信任基础的柬共另起炉灶本非明智选择。更何况宋双将红色高棉视为仅次于越南的“柬埔寨第二大敌人”,与越南一直主张的在政治解决中排除波尔布特的立场十分接近,这尤其不能为北京所接受。新华社记者在与宋双交谈后,认为其“对越南仇恨不深,对民柬有颇深的仇恨”“反共思想顽固,政客手腕娴熟”。^③宋双的参谋长丁代尔更是直言当下与红色高棉联合的条件不成熟,他坦言“红色高棉是老虎,我们是牛,联合就会被吃掉,等我们成老虎之后再联合”。宋双曾不止一次主动向中国请求援助可以装备三万人的武器装备,由于无法取得信任,均未得到应允。

① 《柬埔寨三方会晤和联合问题》,1981年10月10日,河北省档案馆,档号937-4-140,第35页。

② Johan Saravanamuttu, *Malaysia's Foreign Policy: The First Fifty Year*,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10, p. 174.

③ 《宋双的政治主张和当前策略》,1981年3月18日,载新华社编:《国际内参》1981年第20期,第11—17页。

越南入侵柬埔寨后,东盟五国多次在外交上强烈谴责越南并要求撤军,^①但在推动三方联合的问题上却进展不利。民柬在1979年就曾号召三方联合,但因彼此积怨过深没有成功。抗越联盟的问题到了1980年出现转机。6月23日,越军入侵泰国暖马木村,这使得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转变态度,紧接着举办的第十三届东盟外长会议决定中断与越南的对话。作为抗越三方的直接庇护国,泰国的态度甚为关键,由于直接地感受到了越南的威胁,泰国转而积极并且强硬地推动宋双和西哈努克与民柬联合。^②

三派在泰国的直接施压下自1981年2月启动历时7个月的谈判。9月2—4日,三方发表关于成立联合政府的四点声明,并决定设立特别委员会商讨具体事宜。特委会经过10轮商谈后于11月14日就联合政府的组织原则和框架达成重要协议。中泰两国此时在抗越问题上的立场十分一致,邓小平直言泰国是“中国同东盟国家合作的桥梁”,^③中国早在1980年便制定了包括直接军事干涉在内的援泰计划。^④因此,上述一系列政治商谈不可避免地使民柬取得了主动地位,加之1981年9月18日三十六届联大再次认可了民柬席位,以及当年10月20日柬埔寨问题决议在联大的支持率上升,波尔布特“以我为主”的想法越发突出,他甚至要求联合政府“必须保持无产阶级专政”。宋双则打算获取联合政府中的多数席位并要求强制波尔布特等柬共领导人流亡国外。^⑤西哈努克则既不满意民柬掌握主动权,也反对宋双的要求,而是提出平分席位的主张。^⑥三方的要求相去甚远,宋双和西哈努克均打算退出会谈。

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尼不能接受没有宋双当总理的联合政府。7月14日,在三国的推动下,东盟在联合国柬埔寨问题国际会议上提出全面政治解决的五点设想。^⑦其中,“柬埔寨各方解除武装”和“建立一个临时过渡政权”这两

① “Statement by Malaysian Representative Zaiton in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on the China-Vietnam Conflict,” February 25, 1979, in RK Jain, ed., *China and Malaysia, 1949-1983*, p. 260.

② 《柬埔寨各方出现联合抗越新趋势》,1981年3月11日,第2—6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871页。

④ 电话访谈原聂荣臻办公室主任刘长明记录,2020年6月11日。

⑤ 《在坎珂道路上前进的柬埔寨三派联合》,1982年1月10日,载新华社编:《国际内参》1982年第3期,第3页。

⑥ 《西哈努克派代表对新华社记者谈三方会谈》,1981年10月11日,载新华社编:《国际内参》1981年第78期,第11页。

⑦ 即柬各方停火,联合国维和部队进驻;越南在联合国监督下撤军;解除一切柬埔寨人的武装;建立临时政府机构;柬人民在联合国监督下进行选举。参见中联部二局编:《有关国家和组织对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建议和主张》(内部资料),1987年版,第5页。

点明显针对民柬。在中国的推动下,这两点内容最后遭否决。但是,东盟三国并未放弃自己的立场,11月21日,新加坡副总理拉贾拉南和外长达纳巴兰突然访泰,三天后公布组建松散联合政府的新建议。在中方看来,新建议在继续推动会谈的同时意在扭转宋双和西哈努克在特委会中的不利局面,实现以宋双为代表的“第三力量”取代民柬主导地位的目标。

由此,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尼一方与民柬、中国一方的关系陷入紧张,中国对东盟各国的做法极为不满。1981年9月,外交部部长黄华在内部讲话中对东盟的这种不满情绪溢于言表。他批评印尼、马来西亚错误地视中国而非苏越是最大的威胁,认为东盟这样做的目的是“幻想牺牲民柬来迎合越南,讨好苏联,同苏越达成妥协,换取苏越停止南下并对付中国”,黄华肯定这种做法是会带来灾难的战略性判断和政策错误,东盟“必先深受其害”。^①

最终,三派于1982年6月22日在吉隆坡宣布成立以西哈努克为主席的松散的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CGDK)。联合政府的成立并不意味着中国和新、马、印尼在抗越联盟及柬埔寨政治解决问题上最终形成共识。尤其是在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上,三国的想法却与越南继续靠近,即柬埔寨问题区域化并在印支三国和东盟之间实现政治解决。当年6月举行的第十五届外长会议期间,印尼、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邀请越南外长阮基石访问本国。7月18—30日,越南外长阮基石访问了新马泰和缅甸。阮基石采用了拉拢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孤立泰国的策略,而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共产党的关系再次成为越南离间策略的工具。^② 马来西亚和越南在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上的立场此后有进一步的靠近。1983年3月上旬,加扎利在新德里第七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期间提出由东盟五国与越南、老挝谈判解决柬埔寨问题的“五加二”方案,该方案未将撤军和自决两项原则列入其中。^③

1984—1985年,越南军队对设在柬泰边境的各派抵抗力量基地发动旱季军事攻势,由于组织松散且未真正实现军事联合,只限于外交作用的民柬联合政府无力抵抗。越南军队占领这些基地之后,基本切断国际社会通过泰国运

^① 《黄华在全国地方外事工作会议上关于国际形势和对外政策的讲话(摘要)》,1981年9月1日,河北省档案馆,档号1057-8-44,第10页。

^② 《对越外长东南亚四国之行的看法》,1982年8月11日,载新华社编:《国际内参》,1982年第63期,第14—20页。

^③ 中联部二局编:《有关国家和组织对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建议和主张》,第5页。

送物资进入柬埔寨的通道,从而使得抵抗力量的进一步发展成为问题,此后双方军事对抗进入僵持状态。^①

五、东南亚冷战终结与中马关系“重启”(1984—1989)

当抗越力量和越南军队在柬泰边境一带陷入对峙之际,整个印支地区的形势同步进入了调整期。20世纪80年代中期,东南亚冷战整体格局开始松动并走向终结。从中国的东南亚安全战略的角度来看,最为关键的第一步首先是中苏关系的松动。

中苏关系正常化进程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呈现出加速趋势,中苏双方都开始表达了缓和紧张关系的意愿。^②1984年5月,金日成访问莫斯科,向苏联最高领导层转达了中国改善中苏关系的意愿。契尔年科虽有些怀疑,但依旧向金日成表示苏方愿意改善与中国的关系。^③中国决策层在得到消息后进一步调整了对苏和解政策。9月4日,胡耀邦告诉外交部部长吴学谦,与苏会晤时候“不必吵架,要讲情况、讲理”,避免陷入20世纪60年代那样的中苏意识形态论战。^④12月,阿尔希波夫访华,打破了多年来禁止称呼苏联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禁忌。戈尔巴乔夫的上台对中国决策层的影响甚为关键。在此前后,中苏关系中的“三大障碍”正式变成了一个,即中方将中苏关系正常化与印支问题直接挂钩。印支问题从大国全球战略对抗的层次回归到东亚地区问题的层次。^⑤1985年10月9日,邓小平请齐奥塞斯库转告戈尔巴乔夫,只要中苏之间在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上达成谅解,他愿以最高领导人身份访苏。邓小平的这一番态度实际上是向戈尔巴乔夫抛出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大绣球,推动后者加速调整政策。^⑥

相比1980年前后,此时中国决策层眼中的苏联威胁开始降低,安全判断

① 李亚男:《冷战后期中国对东南亚地区政策调整(1978—1986)》,第142—143页。

② 关于中苏关系正常化的研究,参见牛军:《冷战时代的中国战略决策》,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9年版。

③ 《胡耀邦与金日成会谈记录》,1984年11月27日。

④ 《胡耀邦与吴学谦关于与苏联会晤问题的谈话记录》,1984年9月4日。

⑤ 牛军:《“回归亚洲”:中苏关系正常化与中国印度支那政策的演变(1979—1989)》,《国际政治研究》2011年第2期,第73页。

⑥ 牛军:《冷战时代的中国战略决策》,第548页。

上升到和平与发展的理论高度。^① 中国最高决策层就战争与和平问题——这个历来被视为是制定国际战略重要依据——的看法发生了微妙变化。1984年夏,邓小平在北戴河就战争与和平问题提出新看法,他认为中国下决心搞四化建设,即使战争发生,只要“不搞到我们的头上”就行,“世界大战即便打起来中国也不会参加”。^②

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印度支那问题之所以成为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唯一前提,与20世纪80年代中期该地区冷战格局的转变密切关联,尤其是柬埔寨问题随着各方态度的缓和而具备了和平政治解决的可能。苏联态度的变化直接导致了越南在对华政策、撤军问题上改变态度。首先是1985年1月的越老柬外交会议公报在对华关系问题上的措辞有所缓和。^③ 紧接着,黎笋于6月在莫斯科访问期间公开表示要恢复中越传统友好睦邻关系。^④ 次年3月4日,越南对外透露了从柬埔寨撤军的时间表。7月,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发表讲话,提到“柬埔寨问题取决于中越关系正常化,现在是良好的时机,整个亚洲都需要这点”。^⑤ 苏越态度的转变很大程度上推动柬埔寨问题朝着民族和解的方向发展,柬埔寨抵抗力量三方提出政治解决的八点建议,号召成立以西哈努克为首的四方联合政府,金边与河内积极回应。^⑥

此时,在中国决策层案头,如何让东南亚各国共产党在完全失去支持的情况下独立发展已是一个亟须落实的议事日程。1984年9月6日,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调整对东南亚各国共产党政策。胡耀邦、万里就泰共、缅共问题拟定了可以具体执行的解决方案。简而言之,中方打算劝说泰共完全放弃武装斗争的计划转向合法斗争道路。缅共的问题相对复杂,中国决策层计划借用中英两国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一国两制”方案,促使奈温政府承认缅共并开辟一到两块“特区”供其经营和生存,从而使缅共合法化并与政府长久和平相处。这套方案最后被提交给邓小平,^⑦ 姑且不论上述政策最后的定夺乃至落实效果,仅就整个建议的思路而言,其内容就折射出中国决策层在处理共产党问题

① 樊超、王珂:《“间接消耗战略”:1980年代中国对苏安全战略再考察》,《国际政治研究》2020年第1期,第83页。

② 《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钱李仁记录)》,1984年9月6日。

③ 中联部二局编:《越南、老挝、柬伪十次外长会议简况》(内部资料),1985年7月版,第9页。

④ 《戈尔巴乔夫和黎笋在苏方宴会上的讲话》,《参考资料》1985年6月29日,第20页。

⑤ 同上,第47页。

⑥ 钱其琛:《外交十记》,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46页。

⑦ 《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钱李仁记录)》,1984年9月6日。

上的进一步转向,即为完全切断对东南亚共产党援助做政策准备。

从结果来看,东南亚共产党问题基本上八到九年就全部解决。1985年以后,除了与澳共(马列)等少数几个新党保持联系外,中共与其他新党不再来往。^①此后,中国对东南亚各国共产党遗留问题的处理进程加速。具体措施包括:通过提供一次性援助方式彻底中断对缅共的援助;撤销印尼共和泰共的在华机构;遣散各党在华工作人员等等。大体上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共产党的联系完全中断。

中国在马共问题上的态度于这两年内发生明显转变。1984年2月,吴学谦到访马来西亚。在谈到马共问题时,吴学谦做出的解释发生了微妙变化。他一方面告诉马来西亚外长加扎利马共问题是马来西亚的内政,中国既不干涉马共内部事务,也不介入马来西亚国内政治,马共问题“不是双边关系问题。”另一方面,吴学谦表示,中共只是打算与马共保持基于道义的关系(moral-based relationship),并就这种关系做出更为明确的解释,即“它与其他任何一种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政党间的关系无异”。为了让马方相信这种道义关系与革命颠覆不存在任何关系,吴学谦保证,如果马共在华人员想回国,并且马来西亚政府愿意接纳,那么,中国随时可以送他们回国。^②

对于当时的陈平和整个马共领导层而言,武装斗争道路已到尽头。马共内部军心严重涣散,部队逃兵不断,整个组织的生存和活动难以持续。^③1986年4月,中联部负责人同陈平等马共领导人协商进一步调整两党关系的问题,中方决定从1987年开始终止对马共的援款,在这之前给予马共一笔大额援款,以便它自力更生解决经费问题;同时,中方决定停止马共以中国为指挥基地与马来西亚国内支部的联系工作。陈平最终对中方的决定采取了理解的立场,并决定留在中国养老。^④10月,中国副总理田纪云访问菲律宾表示将永久性停止对菲共的全部物资和道义援助。^⑤到了马来西亚,田纪云表示中国与马

① 中联部办公厅:《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简史》,第152页。

② “Cable from Ambassador Katori to the Foreign Minister of Japan: Prime Minister’s Visit to China,” March 25, 1984, Wilson Center Digital Archive, ID 119559.

③ 《边委关于内部巩固问题的意见》,1985年3月,华东师范大学当代文献与史料中心藏,《阿成史料》系列,编号0242。

④ 朱良手稿:《中国和马共的历史关系》,未刊,第5页。

⑤ “British Embassy in Philippines: Visit of Chinese Vice Premier Tian Jiyung,” October 27, 1986, British National Archive, London, Document Number: FCO 15/4430, p. 2.

共已“丝毫没有联系”，言外之意，中国的道义支持也不再继续。^①

马共问题的解决为中马关系的发展扫清了主要障碍。此时，马来西亚自身的安全战略出现了转变，鉴于越南威胁的减弱，吉隆坡提出了综合安全观，马哈蒂尔开始集中精力发展国家经济。^② 1984年正值两国建交十周年，2月和5月，中国外长吴学谦和马来西亚外长加扎利互访。实现全面经济合作已经成为马来西亚对华政策的优先目标，这从加扎利率领的访华代表团成员构成可以看出，除了10位政府高级官员外，代表团剩余的22名成员均是马来西亚工商业知名人士及财团负责人。上海市外事部门的接待人员发现，代表团中的马来人商会代表对技术合作十分积极，他们极力向中方推荐天然气开采与利用、铁矿精炼、浮动码头等技术。在与上海市市长的晚宴中，加扎利热情发言，着重表达加强经济合作的愿望。中方十分清楚马来西亚代表团的意图，认为在竞争条件下与马方的合作“也是可能的”。^③ 加扎利的这次到访实际上进一步推动了马来西亚政府调整对华政策，他回国后向内阁和首相提议在不危害国家安全的前提下加强与中国的经贸合作，建议最后获采纳。^④ 从1985年开始，马来西亚开始放宽与中国的民间交往管制，^⑤实际上为全面的经济合作扫除政策障碍。

1985年11月，马哈蒂尔率领庞大的经济代表团访华，出发之前他已经得到中方以最高规格接待的许诺。^⑥ 马哈蒂尔的访问意味着马来西亚政府改变了之前的对华政策，他的这次北京之行与之前的氛围和效果已明显不一样。马哈蒂尔本人更加关注与中国的贸易关系，而不是共产党和华人问题。这是一次成功的访问，在整个代表团离开北京回国之后，中国总理在一次内部的总结讲话中提到，马来西亚总理对这次访问取得的成果“比较满意”。马哈蒂尔本人回国下飞机时即公开表示马共问题不应成为两国发展经济关系的障碍。

① “Political Relations Between Malaysia and China: Visit by Tian Jiyun, Chinese Vice Premier, to Malaysia,” 1986 Jan. 01-1986 Dec. 31, British National Archive, London, Document Number: FCO 15/4590, p. 1.

② 饶兆斌：《冷战结束前的疑虑、踌躇及突破：马中关系1974—1989》，第239页。

③ 《王雪渔关于接待马来西亚政府代表团的纪要》，1984年6月4日，上海市档案馆，档号C48-3-245，第1页。

④ 饶兆斌：《冷战结束前的疑虑、踌躇及突破：马中关系1974—1989》，第240页。

⑤ Mohd Yusof bin Ahmand,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Malaysia's Foreign Policy*, p. 195, 转引自饶兆斌：《冷战结束前的疑虑、踌躇及突破：马中关系1974—1989》，第240页。

⑥ “Some Information Regarding Relation Between Malaysia and China Provided by Dennis Ignatius,” June 25, 1985, British National Archive, London, Document Number: FCO15-4254.

马哈蒂尔北京之行结束不久,马共问题进入了最后解决阶段。1986年6月,马来西亚政府请中方传话给马共表示愿意和谈,中方一边回应这是马来西亚内政事务,同时把此消息告诉陈平。^① 马共和政府通过两年的谈判最终于1989年签订《合艾协议》,马共问题彻底解决。在这之前,中马两国关系已步入了发展快车道。短暂调整之后,双边贸易从1987年开始迅速增长,贸易总额是年达到4.47亿美元,比前一年增长约42.4%。^②

结 论

本文从20世纪80年代中国东南亚安全战略的视角解释中马两国在建交之后双边关系长期陷于悬搁状态的深层次原因,即阻碍中马关系的根本原因并非双边关系中的共产党和华人问题,而是这一时期整个东南亚地区冷战的结构性制约。

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为防止苏联南下对自己形成战略合围,中国在大国关系和地区安全层面建构自身的安全战略,阿富汗和柬埔寨是两个关键的抵抗苏联南下的战略支点。中国在两个地区均采取了建立反苏国际联盟的策略。中国为此全力支持民柬同时促成柬埔寨三方抵抗力量联合,考虑到军事力量、对越立场等现实因素,决策层最终选择全力支持柬共。这就导致了两个结果:第一,中国采取缓步解决东南亚各国共产党遗留问题的方针,在经过一系列的政策平衡之后,继续维持对东南亚各国共产党的支持;第二,中国与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尼三国在柬埔寨本土三派力量联合问题上的分歧始终难以弥合,双方在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上的立场并不一致。对于中马关系而言,这两个结果都形成了结构性的负面效应:一方面,客观上直接或间接强化马共和华人华侨障碍,由于马来西亚一直未能从中国最高层那里获得有关马共问题的政治承诺,其对华政策一直充满猜忌与疑虑;另一方面,中马双方在柬埔寨问题上处于分营对垒的状态,中国始终缺乏优先和根本改善中马关系的意愿。最终的结果就是,双方高层从1978年到1981年期间虽曾有数次外交访问,但均无法让两国关系重启进入发展快车道。

① 朱良手稿:《中国和马共的历史关系》,未刊,第5页。

② 外经贸部编:《对外贸易统计资料汇编(1950—1989)》(内部资料),第52页。

就此而言,中马关系的发展从根本上被中苏关系的基本格局所制约。也恰恰因为如此,中马双边关系的重新启动进程与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苏关系正常化进程呈现明显的正相关。中苏关系正常化加速、印支地区冷战格局缓和等因素使得制约中马关系发展的结构性障碍开始消解。具体体现为中越关系改善、越南在撤军问题上松口、柬埔寨问题朝着民族和解方向发展。由此,柬埔寨作为中国抵挡苏联全球南下扩张的战略支点的地位和角色开始降低。在此情形之下,中国对苏联威胁的判断发生变化,并调整对东南亚各国共产党的政策,最终放弃党与国家关系分离的双轨制,完全切断与马共的关系,阻碍中马关系重启的关键性障碍消除。

中马关系从“悬搁”到“重启”的变化过程显示,改革初期的中国对外政策不得不面对前改革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和历史遗产,由此带来的一些挑战往往超越了中国自身的应对能力,使得对外政策不得不面对一些自身很难解决的结构性困境。中马关系中的“马共障碍”长期存在,其根源在于中国在面临国家安全威胁的时候,不得不对一个主要由于过去革命意识形态因素造成的历史问题采取非意识形态化的应对。换言之,中国支持马共并非出于世界革命的诉求,而是基于自身相对孱弱的国家能力,不得不继续依靠民柬等现有的共产党军事力量,进而实现维持和壮大柬埔寨这个战略支点的目标。这种内在的冲突和矛盾使得当年的决策者不得不感慨这一系列的选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外交上最为棘手的。尽管如此,从整个决策的过程来看,中国高层的目标明确并且十分务实。

本文的研究证实了这一时期中马双边关系有十分明显的“被动性”结构特征,即决定双边关系发展的根本动力和阻力并不在于双边关系内部,而是来自双边关系所处的地区乃至全球的国际关系体系。中马关系这种“被动性”的结构特征并非特例,中国和东欧五国之间的关系也存在着类似的结构特征,即决定双边关系的因素并非是中国和这五个国家之间的直接关系,而是更高一个层级的中苏关系。^①从现实主义理论的角度来看,这种具备“被动性”结构的双边关系绝大部分时候并不具备从根本上改变整个国际关系体系发展方向的可能,甚至对区域性国际关系体系的影响也相当有限。但是,它更多地成为反映

^① 牛军:《从“狐狸”到朋友:1980年代中国对“东欧五国”政策》,《外交评论》2013年第5期,第65—81页。

其他更为重要的双边和多边关系结构变化的晴雨表,也恰恰因为如此,它更能准确地反映出该地区不同力量对比和整个国际关系结构的特征。

最后,回到中马关系本身,中国外交部部长姬鹏飞曾以“有邦交,但无心交”描述中国与那些因共产党问题而彼此貌合神离的邦交国之间的关系。^① 中国领导人早在20世纪80年代也已意识到自身的发展会让马来西亚这类周边国家感到威胁。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来看,尽管中马关系在20世纪90年代进入了迅速发展阶段,但对中国崛起的担忧始终是左右马来西亚国内政治和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并且这种担忧随着近年来中国快速的崛起而不断地增强,马共等问题造成的历史记忆并未完全在马来西亚政府和民众的脑中消除,马来西亚在中国高铁项目上的态度反复正折射出这一点。对中国而言,如何正视这一长期影响两国关系的历史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种可以长期有效的双边和多边互信机制,实现及时、有效的国际信息沟通,避免战略性误判的发生,乃是紧迫和必要的工作。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步骤之一,在笔者看来,是需要研究者对中马关系历史上的诸多问题进行更为严谨与客观的考证和澄清。

^① 《姬鹏飞在驻外使节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79年7月。